

从乐业到安居：西南边境外籍人员 社区变迁的动力机制研究*

张方亮 游天龙

提 要：我国学术界目前较少对我国境内外籍人员社区的生成与变迁的机制进行研究。本文基于内外秩序视角，结合移民创业、移民经济与社区结构理论，对位于我国云南瑞丽的外籍人员社区的起源、变迁与衰败过程进行了深入调研与分析。研究发现，外籍翡翠商人创业经商过程中独特的雇佣关系促进了翡翠业移民经济的发展，继而生成了外籍人员聚居的社区。在这些社区中，外籍翡翠商人群体积极联合多方主体参与社区治理，从而形成了多层重叠的中介型社区治理结构。我国的社会治理体系作为外籍人员社区治理的外部结构秩序，以地方政府为主体，通过政策设计和多种治理手段影响外籍人员社区的治理秩序，推动了外籍人员社区的历时性变迁。

关键词：移民经济 外籍人员社区 社区治理结构 边境社会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因经贸、工作、留学等原因前来我国的外籍人员数量大大增加。根据七普数据，2020年我国境内外籍人员数量约为70万人，而云南省是我国外籍人员数量排名第一的省份，有外籍人员约38万人。我国东部的几个国际化程度较高的经贸枢纽城市已经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外籍人员社区（immigrant community），比如北京的韩国城、广州的巧克力城、上海的古北区、义乌的异国风情街等（李志刚、杜枫，2012；周雯婷、刘云刚，2015；Ma，2019；何俊芳、石欣博，2020）。

* 本文是“云南大学‘双一流’建设项目——中国乡村社会大调查（China Rural Social Survey）瑞丽市课题组”项目（主持人：游天龙）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所谓外籍人员社区，是指外籍人员在移居国内形成的与周边社区有着清晰的社会和文化边界、同时又与主流社会相互依存的特殊居住区（Zhou, 1993）。虽然国际学界对外籍人员社区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对其形成原因却众说纷纭。传统移居国的外籍人员社区大多出现于 19 世纪，但由于各种原因，其形成初期的相关资料付之阙如，让后世学者无法清晰窥其成因。而在 20 世纪后半叶出现的外籍人员社区，因为传统移居国的社会结构、制度环境和族裔关系等因素与我国迥异，因而相关文献在研究分析我国的类似社区时常常并不适用。

除了我国东部的国际商贸重镇成了外籍人员社区以外，我国边疆地区也有许多外籍人员社区。其中，位于我国西南边陲的瑞丽市的跨境人口流动活动历史悠久。早在明清时期，瑞丽市就是中缅边境上的商贸重镇，长久以来形成了成熟的商贸网络与开放包容的文化环境，瑞丽本地居民对缅甸人接纳程度较高。瑞丽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早进行沿边开放的口岸城市之一，外籍人员社区的起源与发展历程与我国的边疆建设、“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缅命运共同体构建等密切相关。因此，研究瑞丽外籍人员社区的变迁可以探索我国宏观地缘政治战略与微观外籍社区基层治理间的理论关联与现实意涵。

本文的研究团队于 2017 年 1 月至 2023 年 2 月期间，在瑞丽市进行了 12 次田野调查，每次为期两周到两个半月。笔者首先通过私人关系结识了在珠宝市场卖翡翠的 AL^①，并通过他的社交圈以滚雪球的方式拓展访谈对象。其次借助研究团队成员在直播公司实习的机会进行田野观察和访谈，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再次，研究团队还通过云南省乡村振兴局联系了直播基地、市场管理企业、市场监管部门等机构负责人，并对其进行深入访谈。此外，研究团队还在瑞丽市的各大珠宝市场对外籍人员进行了大量非结构式访谈，访谈通常是在他们没有顾客需要接待的时候进行。最后研究团队选择持续性跟踪调查和持续回访，并且一直保持与调研对象的线上交往，通过网络实时参与和观察他们的生活。研究团队共采访了 81 位外籍人员和 74 位中国人。平均访谈时长约两小时，形成总计超过 150 万字的访谈记录。

基于以上调研资料，本文以依托翡翠业而发展起来的瑞丽外籍人员社区为例，尝试通过内外秩序视角观察外籍人员社区秩序的生成和变迁问题。本文将移民经济内部雇佣关系的出现和维系、外籍人员社区内部组织的生发和组织间的关系视为社

① 已经征得受访者同意，并对其进行严格的匿名化处理。

区的内部秩序；将所在地区的基础设施治理（infrastructural governance）^①、间接治理和直接治理对社区治理结构每一个层面的塑造作用，视为外部秩序。同时，本文关注联结内外秩序的中介组织商会与内外秩序之间的纵向互动，从而深刻解读社区内外秩序之间的交织影响如何形成了整个社区治理结构。最后，本文通过分析当内外秩序的治理目标不一致时社区治理结构调整的机制和成效，以解释案例中外籍人员社区治理秩序难以维系的原因。

二、社会秩序、社区结构与移民经济发展的研究与探讨

移民经济与外籍人员社区一直以来都是移民研究关注的重点，然而却鲜有研究关注外籍人员社区的治理结构和移民经济之间的关系。学界围绕社区治理结构形成了精英论与多元论两个差异较大的见解。精英论认为公众只是政策的接受者，精英是主导社区发展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Hunter, 2017）。达尔（Dahl, 2011）则主张多元论，认为社区权力分散在多个群体中，不同事件的决策者是不同的，因此治理中心是变动的和多元的。两派观点经过多番修正，将研究视野投向社区内部各项要素的互动与影响、结构的变动等议题（Polsoy, 1960）。两派虽然核心观点迥异，但都认为社区结构往往是金字塔式的，并发现那些影响社区经济系统的个体往往也会影响社区的治理系统，会积极领导和参与社区的公共生活和成员的私人生活（项飙, 2018；Brady, 1943；Mills, 1958）。然而，与相关文献主要关注的本地居民社区相比，外籍人员社区的结构、构建方式、支配形式、强人来源都有不同。因此，本研究尝试从移民创业和经济视角出发，以便更好地理解这类社区结构的形成与演变机制。

现有文献对于移民创业（immigrant entrepreneurship）的研究，通常将其构成的经济体分成两个类别：“中间商经济”（middleman economy）和“聚集区经济”（enclave economy）。在美国，“中间商经济”指的是华裔、韩裔等移民群体利用白人企业无法或不愿进入犯罪率高、居民收入低的非洲裔、拉丁裔社区所提供的市场机遇，成为为这

^① 基础设施治理：指国家通过影响流动的社会技术条件来密切管理移民，例如定义商业中介机构的功能和责任，决定移民在出发前应该接受什么样的培训、规定文件类型以及如何和何时提交。这种治理模式可以被称为“基础设施治理”（Xiang, 2017）。

些商业设施匮乏的社区提供服务的“中间商”(Min, 1996)。因为移民业主倾向于雇佣同族同籍的员工,他们之间的雇佣关系往往和主流社会的劳资制度存在较大差异,也未能和他们所处的社区形成紧密关系。这种“悬浮”状态导致主流社会的地方治理者甚少能有效管理移民经济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聚集区经济”指的是移民业主选择在外籍人员社区(immigrant community)创业,主要接待同族(coethnicity)顾客,身处同族社会结构(coethnic social structure)之中(Light, et al., 1994; Zhou, 2007)。聚居区经济中,不少移民业主会积极担任社区组织的领导岗位,努力成为该社区的精英,借此更快地积累社会资本,从而弥补他们在金融资本、人力资本方面的劣势,助力自己的生意(Zhou & Cho, 2010; 狄金华、周敏, 2016; 周敏、王大磊, 2021)。

因此,移民在同族社区开创和经营企业,不仅会形成和发展聚居区经济,还会同步促进同族社区的发展(Liu, et al., 2014; Schuch & Wang, 2015)。而得到移民经济支持的外籍人员社区,其社会结构也会由丰富多样、数量可观的社区组织构成,逐步实现布勒东所谓的“组织完整性”(Breton, 1964)。外籍人员社区组织完整性的高低,决定了该社区社会结构、自给自足能力和满足社区成员多元化需求能力的强弱。一个具有高度“组织完整性”的外籍人员社区有助于同族成员更好地适应移居国社会,并赋予同族成员更强的向上社会流动性(Lin & Zhou, 2005; 周敏、王大磊, 2021)。同时,外部环境也影响着外籍人员社区的形成与发展。在我国,政社关系,城市的物质环境、商贸环境和区位优势,社区的治理水平以及国际环境都是影响外籍人员社区的重要因素(赵聚军、齐媛, 2020; 宋宗员等, 2022)。

以上关于移民经济和外籍人员社区的文献,虽然对于理解我国当下不同外籍人员社区发展程度的差异提供了相对可靠的分析视角,但却存在一些不足。现有研究大多分为两大路径,一条路径是探讨外籍人员社区的内部构成,另一条路径是讨论外部环境对外籍人员社区的影响,缺少探讨社区内部结构与外部环境之间互动的实证研究。具体来说,外籍人员社区往往在地方治理中被边缘化,社区内各股力量博弈,并最终形成一个杂糅资本、关系、文化为一体的、具有一定治理能力的社区组织。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宗亲会历史上也经常是由大商家们牵头设立,依靠祖先崇拜等信仰纽带和基于血缘、亲缘、地缘或业缘的关系,通过为社区提供一定公共服务进而占据华人社区的主导地位。而在欧美各国其他外籍人员社区,都存在这种扮演社区和政府之间中间人角色的社区组织。但这些社区组织是如何协调和平衡内外秩序,却鲜少有学者进行讨论。

由于我国不是传统移民国家，对外籍人员的治理也区别于西方传统移居国家对移民的治理模式，因此我国的外籍人员社区治理具有特殊性。基于此，本文将借助“内外秩序”分析框架，以解释在我国的外籍人员社区内部运作与外部政策影响的互动如何形塑外籍人员社区的结构，并影响外籍人员社区的变迁。关于秩序的分类和作用机制，有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分析，其中哈耶克（2000：55—56）认为，人类社会中存在种种有序的结构，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人造的秩序”，也就是一种源于外部的秩序或安排；一个是“增长的秩序”，也就是一种自我生成的或源于内部的秩序，也可被称为自生自发秩序。哈耶克（2000：35）借用了亚当·斯密的观点来论述两种秩序之间的关系：内外原则一致时，人可以顺利并和谐地进化下去；当内外原则相反或对立时，社会则会处于失序状态。同时，哈耶克（2000：70—75）引入“组织”概念，解释复杂的人类活动如何被纳入秩序之中，并强调组织规则与自生自发秩序规则之间的交织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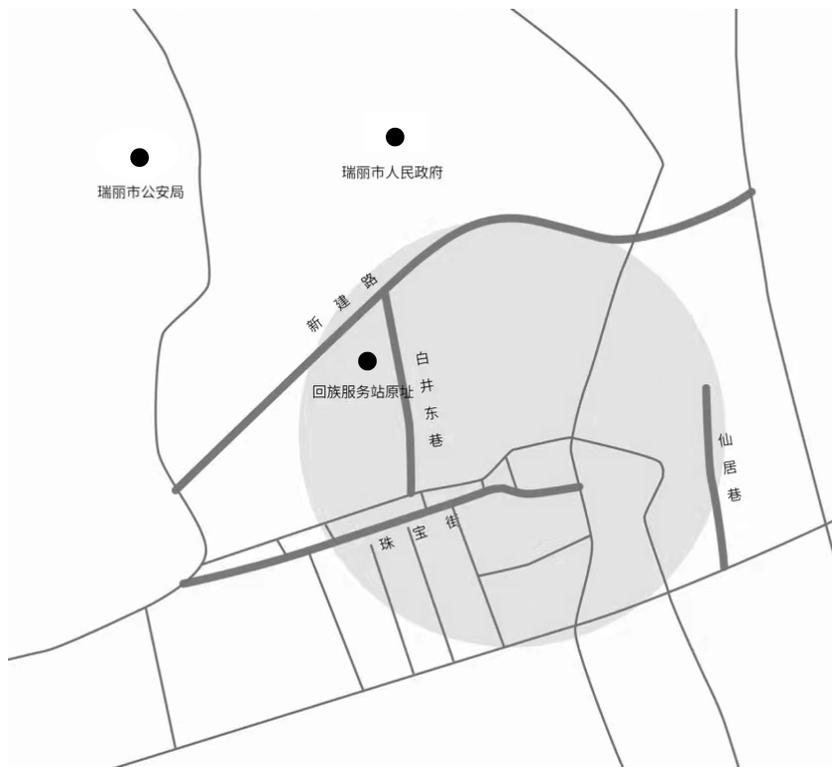
基于上述文献梳理，本文将首先关注中缅边境翡翠业移民创业中出现的雇佣关系和由其生发的阶层关系，以解释外籍人员社区内部微观秩序的构成。然后本文将进一步讨论由雇主商人群体所形成的、带有社区治理功能的中介组织——外籍珠宝商会，并剖析雇主阶层是如何利用经济利益、族群认同和观念认知等多种方式建立、强化并维系对普通外籍人员的管理以实现社区的有效治理，以及如何通过充当中间人角色帮助瑞丽政府和社区居民衔接的中介功能，维持内部秩序和外部秩序的均衡。之后，本文结合瑞丽政府对外籍人员的管理策略解释外籍人员社区外部秩序的构成，探讨瑞丽政府的基础设施治理如何发挥依法管理边民流动的作用，间接治理是如何在中层结构中引导和扶持中介性社区组织，以及直接治理是如何在社区结构层面强化地方政府对移民日常生活的治理。最后，本文结合翡翠直播电商兴起和瑞丽地方秩序转向这两个接连出现的事件对原有结构的影响来分析这个多层结构内在秩序的不稳定性和外在秩序的变动性。

三、外籍人员社区的内外秩序与结构

瑞丽市隶属于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西部，三面与缅甸克钦邦毗邻。翡翠产自现在缅甸的勐拱北部和西北部等地（吴丁埃，1962：54—55）。翡翠

贸易始于明代晚期，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依靠往来频繁的跨境商贾，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商贸网络。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决定在瑞丽打造特色珠宝小城，为外籍珠宝商跨境流动经商提供便利，极大地促进了瑞丽珠宝贸易的发展，使其赢得“东方珠宝城”的美誉。瑞丽成熟的翡翠商贸网络是形成外籍人员社区的业缘基础，边境地区的跨境民族往来也让不少外籍人员掌握了一定的云南方言，为他们在瑞丽的长期生活提供了便利。

以缅甸商人为主的外籍人员社区位于瑞丽市珠宝商业步行街附近，为自发形成的开放式居住聚集区。如图 1 所示，瑞丽市人民政府位于该社区东北侧，距离该社区仅 200 米。瑞丽市信俗服务站旧址坐落于该社区北侧。瑞丽市公安局位于该社区西北侧，距离约 800 米。截至 2022 年 3 月，居住在该社区内的外籍人员约有 1000 人，是一个多民族、多信仰、多文化的社区。



注：图中灰色区域为外籍人员社区的大致范围。

图 1 外籍人员社区社区地理位置

外籍人员社区的结构是多方参与者在持续的互动、博弈、竞争中不断构建、完善的，不同参与者之间既有交织互动性，又有等级性。各层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形成了该社区的内外秩序，当内外秩序协调一致时，社区运行平稳有序；当内外秩序产生矛盾时，社区也面临着失衡和衰颓。

（一）内部秩序：依托同族雇佣关系建构的基层关系结构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让瑞丽边境贸易再度繁荣，吸引了一批外籍人员来做生意。他们很快进入了当时重新振兴的翡翠业，利用语言与族群优势平衡了缅甸翡翠行业中的各方力量，在玉矿收货后，再将翡翠带到瑞丽售卖。早期的外籍商人都是游商，背着腰包装着各种简易的翡翠饰品在瑞丽的农贸市场兜售，碰到中国人就问“老板，好货，要不要”，或者像卖菜一样吆喝“10块钱一筐”。因为他们的翡翠价格低廉，且当时瑞丽旅游业兴盛，游客众多，所以销量很好。最早投身翡翠业的外籍人员快速致富，成功转型为从事翡翠跨境贸易的“中间商”（Light, 2010）。

翡翠业发展和外籍人员社区的建立有赖于我国整体社会经济局势的变化。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坚定了我国走改革开放道路的决心。同年，中央实施沿边开放战略，瑞丽被列为全国14个沿边开放城市之一，并被批准设立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在中央政策指引下，瑞丽兴建了全国第一个珠宝市场，并规范管理过去乱象纷呈的翡翠业，一方面管理外籍游商的无序商业行为，一方面引导有实力的外籍商人进驻珠宝市场，并在消费者中间形成了买真货要去珠宝市场的良性预期，无形中给行业设立了准入门槛，促成了外籍商人群体内部的阶层分化和秩序的萌发。

在由游商向店商的转型中，对外部环境变化有敏锐性的外籍商人迅速租赁珠宝市场的店铺，部分财力雄厚的商人在吃了政策“定心丸”之后，在翡翠产业链的上下游扩张，不少人在自己的店铺或居住地附近建立加工店，实现原石供应、加工打磨、店铺经销的全产业链布局，并且可以根据顾客的喜好做出调整，有效降低了运营成本，扩大了利润率。而一些继续在街头游走兜售翡翠制品的外籍商人因缺乏资金和开店所需的合法证件，短时间内无法转型店商。他们中的一部分，与闻讯而来的后来者一道成为外籍店商的雇员。

外籍人员的阶层分化以及内部雇佣关系的建立不仅为店商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

力，更为雇主阶层进一步强化对该行业的管理提供了必要的人力资源。为了保障和提高利润，雇主们采取了恩威并施的手段围绕雇佣关系构建微观秩序。那些掌握了翡翠货源、销售渠道和专业技术的雇主们通过产品分销、技术传授的方式获得雇员阶层的支持，扩大了他们在族群内部的管理力和对行业的支配力。

对技术、关系、货源的垄断进一步强化了雇主在同国籍雇员面前的地位优势。HJ 在国外时，听说瑞丽生意好做，便于 2010 年带了约 1000 元人民币到瑞丽投靠早几年到的同乡大哥，希望大哥能教他鉴别翡翠原石，方便他日后做生意。于是，大哥便让他到自己的店里当帮工。但他在同乡大哥的店里打工了 2 年，除了做日常的杂事外，完全学不到如何鉴定翡翠原石等的专业知识。HJ 表示：

我为他几乎免费干活干了 2 年，我就想学习怎么看翡翠（鉴别翡翠真假），但是他什么都不教我。这个人太坏了，我后来就自己学，跟着别的朋友看，跟着他们学，我才学会看石头。（访谈资料编号：20220219 HJ）

其次，外籍雇员不仅要完成日常销售工作，还要以各种方式维护各自雇主的利益或争夺市场份额。一般情况下，在珠宝市场“不抢生意”是隐形规则。但当外籍雇员业绩不好时，因为面临没有收入的困境，甚至会被雇主“赶出去”，所以这时候雇员会冒着和别家发生冲突的风险去抢生意，而其他利益受损的店家雇员则会激烈地捍卫自家利益，雇主们往往对此不置可否。

在这种情况下，翡翠生意自然出现以男性为主体、以家族成员为核心的特点，往往大哥或者叔叔是老板，弟弟和侄子做雇员。而随着翡翠业规模的扩大和市场的逐步规范化，翡翠生意也开始向同国籍的其他非亲缘男性开放。而为了维持基层秩序，雇主们开始在雇佣关系的基础之上积极营造一种“拟亲”关系，同国籍雇主和雇员之间以“兄弟”“叔侄”相称，而且同国籍雇主也会像长辈一样为雇员考虑未来职业发展和婚姻家庭等现实问题。正是如此，外籍雇员也更愿意接受同国籍雇主的一些看似不合理的用工方式，比如没有固定工资而按照当天营业额的一定比例支付工资，以换取雇主日后对其自立门户的支持。这种“拟亲”关系也不仅局限于雇主和雇员之间，还具备一定的延展性，比如雇主的妻子也会将雇员视为家庭成员，为他们一并准备饭菜。

但是，看似亲密的拟亲关系背后则是惩戒机制，是维系雇主对雇员管理的重要

基础，哪怕双方是血亲。MMD 于 2012 年因为原籍国国内族群矛盾而被迫到瑞丽并投靠他的表叔，他就遭遇了作为雇主阶层的表叔的不合理对待：

他对我非常坏。他不给我钱，只给我吃饭，我心里很难过。有一次，他说他的钱不见了，我发誓，我没有偷他的钱，可是他不相信，对我非常恶劣……之后，我就逃跑了，离开了他。我找别的老乡一起做生意，终于遇到了好人，我可以在瑞丽活下来。（访谈资料编号：20220218 MMD）

结合拟亲关系和惩戒机制的雇佣关系形成了外籍人员族群内部的阶层分化，雇主和雇员之间复杂的情感和经济联系成为建构族群内部基层秩序的基础。这种基层秩序加深了雇主与雇员之间的纽带并维护了共同利益，进一步加强了社区完整性。这种自生自发的秩序构成了外籍人员社区内部的运行规则，即以国籍身份为淮入门槛，追逐经济利益为最高目标。但是，这种基层单位存在利益张力，因此需要更高层的组织对其进行整合与平衡。

（二）内外中介：以缅甸珠宝商会为中心的重叠式中层结构

随着外籍商人主导的翡翠业继续发展壮大，更多外籍人员的从业选择开始呈现多元化特征，出现了服务外籍人员的其他行业，比如餐馆、咖啡店、小卖部、理发店等，逐渐形成了聚居区经济。在这个以翡翠业为核心、其他行业配套运行的经济模式下，仅依靠翡翠经济内的拟亲关系和管理能力已不足以解决行业和社区内外的的问题：小到境内外商拖欠账款、货不对板，大到原籍国的政局动荡和我国的居留政策变动。而社区内部还存在诸如外籍儿童的基础教育、外籍商人的信仰等生活方面的需求，这都需要外籍人员社区在逐步实现经济层面“组织完整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治理层面的“组织完整性”。

2008 年外籍翡翠商人联合成立了瑞丽缅甸珠宝商会。这个商会虽然是由外籍商人 PJ 牵头成立，但在某种程度上是瑞丽市政府管理在瑞外籍人员的中介组织。截至 2022 年 3 月统计，瑞丽市外籍珠宝商会在册会员共 500 多人，囊括了多个外籍族群的珠宝商人。该商会对内的主要职能是解决翡翠交易的纠纷，大部分外籍珠宝商人遇到问题都会寻找该商会的会长 PJ 帮忙。而商会的另一个对内职能则是组织的文娱活动，比如足球赛、藤球赛、歌舞会等。商会的对外职能是与瑞丽市政府沟通协商

在瑞丽居住的外籍人员的生活、信俗、学习等问题。一方面，他们协助瑞丽政府承担外籍人员社区的部分公共服务，比如传达我国的政策法规、宣传我国的文化习俗，或在华外籍人员所涉及的治安管理问题；另一方面，商会又是瑞丽政府与社区间上传下达的信息渠道，传达和落实与在华外籍人员生活息息相关的诉求。比如他们与瑞丽政府合作筹建了多所外语学校，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在华外籍儿童的教育问题，满足了外籍人员社区的生活需求。

在为社区提供公共服务之外，商会也通过信俗和教育两个渠道来加强他们在社区成员中的影响力。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外籍人员刚刚抵达我国时，他们只能在自己家里进行信俗活动。随着外籍人员人数的增多，外籍的专业信俗人员也来到瑞丽为他们提供信俗服务。之后，随着在华外籍人员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瑞丽政府开始将他们的信俗活动纳入我国的信俗事务管理之中，建造了信俗服务站让他们在限定范围内开展礼拜与庆典活动。瑞丽的信俗服务站于 1998 年建盖了 140 多平方米的水房，又于 2001 年建成 400 多平方米的活动大厅。1998 年信俗服务站建成后，为了方便信俗活动，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员搬到这附近居住，围绕信俗服务站形成了外籍人员社区的雏形。在商会成立以后，外籍商会会长 PJ 便从原籍国找到了有威望的专业信俗工作者带来瑞丽。这些得到商会扶持的专业信俗工作者很快获得了更多的信众，并在商会指导下传授尊重我国法律和习俗、旨在营造良好经商环境和劳资关系的信俗理念。笔者曾在调查时听过一个外籍专业信俗工作者在教导一个随地吐槟榔的信徒时讲到：

我们在中国必须尊重中国的法规，这是经文里教导我们的，我们必须遵循。
(访谈资料编号：20180811 YMT)

而另一个外籍人员 GYW 告诉我们说：

教我们的老师（某专业信俗工作者）曾说过，我们在中国吃饭就要用筷子，中国有事情你要帮中国。他告诉我这是经文里要求的。（访谈资料编号：20210810 GYW）

商会不仅通过他们所扶持的专业信俗工作者来对社区信俗活动进行间接管理，

还通过外籍人员筛查、干预信俗活动内容的方式来进行直接管理。比如商会领导人会亲自或者派人在信俗服务站审查往来的外籍人员，判断哪些人是新面孔并询问他们是通过谁的关系到瑞丽的，据此排查潜在风险。在每周的信俗活动之前，PJ还会和所有到场的外籍人员讲解我国近期法规以及我国的文化传统、卫生习惯，并要求大家遵守。他经常说：

我们要听这个国家的话。如果你们不听话，你们也没办法留在中国，到时候大家都做不了生意，我也帮不了你们。（访谈资料编号：20170818 PJ）

透过对信俗活动的影响，商会扩大了他们在社区内的影响力，从而强化对社区成员的管理工作。信俗服务站内有一个由商会授意成立的领导小组，负责对社区居民进行管理。这个领导小组成员大多从事翡翠业，同时兼任信俗服务站内信徒的管理工作。他们对那些涉及违法违规、破坏公序良俗、存在商业不端等失范行为的外籍人员进行惩戒。

同时，商会通过外语学校教育对外籍儿童进行规训，传播适合在我国生活和经商的理念。在瑞丽开办学校的外语校长 WDL 曾一再表示：

我们国家所有族群都是一样的，我们是一家人，不管你是什么族，我们都是外国人。（访谈资料编号：20170111 WDL）

此外，外语校长 WDL 也常常会和自己的学生说：

你们要尊重中国的习俗，这不是你们的国家，你们不可以乱来。（访谈资料编号：20170822 WDL）

瑞丽外籍珠宝商会的成立整合了外籍人员原本各自独立的组织和社会关系，标志着外籍人员社区内中层结构的建构。由于商会整合了社区内族群、信俗、文化等多重资源，进而形成了多层重叠的中层结构。该结构内部仍旧存在等级性，而这种等级性的建构与移民经济内的阶层分化有极大的关联。通过联结社区内外，商会将外籍人员社区内复杂的移民活动纳入秩序之中，并通过多种治理手段的结合，将地

方政府要求他们的法规传达并内化为他们的行为准则，从而达成两种秩序间的协调一致，促进外籍人员社区的平稳运行和稳步发展。而这个内外中介角色的成立，有赖于一个隐藏的前提，即地方政府在边境安定的条件下将经济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因此，瑞丽政府才需要商会作为中介来协助治理掌握大量经济资源但又和本地文化、信俗、生活方式存在巨大差异的群体。而构建在微观经济关系之上外籍人员社区也需要商会向地方政府申请扶助政策，解决他们现实生活中的困难，才能将更多的精力用于经商活动。

（三）外部秩序：在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中寻找平衡的当地治理者

自古以来，中缅两国人民就以“胞波”（兄弟）相称。瑞丽与缅甸边境地区木姐、南坎一带在历史上同属于麓川土司管辖的勐卯城，生活在该区域的居民具有共同的文化和生活习俗。此外，中缅间跨境民族众多，例如瑞丽的傣族、景颇族与缅甸的掸族、克钦族都是血脉相连、同宗同源的跨境民族。1960年，中缅两国正式划界。两国人民虽然逐步产生边界意识，但依旧保持紧密的情感联系，常年保持着通婚、经商、学习等友好交往。因此，当地人对缅甸人较为接纳。

进入21世纪后，中缅两国往来更加频繁，并就边境合作达成共识。姐告口岸实行“境内关外”特殊管理模式并成为国家级口岸；而与姐告口岸相邻的木姐口岸成为由缅甸商务部直接管理的口岸，并拥有与缅甸仰光口岸相同的对外贸易审批管理权限。在两国口岸政策优化的背景下，到瑞丽经商生活的缅甸人越来越多，并逐渐形成了缅甸人社区。但边境社会作为保障国土安全的前沿阵地，在鼓励外国人到华经商，大力发展经济的前提下，也需要保证边境安全。因此，瑞丽市政府一直在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中寻求平衡，在外籍人员治理上经历了一个从基础设施治理，到间接治理，再到直接治理的逐渐升级、多措并举的过程。瑞丽市政府在翡翠经济和外籍人员社区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既为整个社区秩序提供底层逻辑，也为该秩序提供政策支持。

翡翠从业人员流动性强、涉及人员范围广泛，既有外籍商人和劳工这样的跨境流动人群，也有我国消费者、经销商等境内流动人群。最初瑞丽政府的治理资源有限，所以将治理重点放在影响流动的基础设施上（项飏、林德奎斯特，2019），例如外籍人员出入境证件管理和租房管理。而瑞丽通过基础设施进行治理并不只是一个策略性措施，而是治理思路的转变，从过去侧重管理“谁”来瑞丽

做生意转向侧重管理“如何”在瑞丽做生意，从而间接影响流动人员的构成和流动规模。因此，瑞丽市政府先在当地兴建珠宝市场等商业性基础设施；而后，为了更好地管理外籍信俗人员，在市场周边兴建信俗服务站。通过对这两处基础设施的治理，瑞丽市政府得以掌握围绕翡翠业而出现的大量流动人口的基本信息，特别是跨境流动人口基本信息，并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两方面取得平衡。对于外籍人员来说，商业性基础设施的出现提高了翡翠行业的准入门槛，有效地甄别出了有能力、有见识的外籍商人。这使得外籍来华人员内部出现了雇主和雇员的分化，并逐步形成社区内部的基层秩序。而信俗服务站则区分了不同的信俗群体，通过提供信俗场所的方式聚集了不同外籍人员群体，和珠宝市场一起作为核心设施“孵化”了外籍人员社区，并为瑞丽政府借助商会力量治理外籍人员提供了另一个重要渠道。

之后，瑞丽政府延续了通过修建基础设施来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双重目标的治理思路。2000年，中央政府将瑞丽姐告口岸升级为我国第一个境内关外的贸易口岸，并授权瑞丽实行更自主的国际化政策。在中央进一步开放的政策鼓舞下，瑞丽兴建了更加正规、管理严格、实行人车货分流的口岸国门、国道和货栈，2005年又修建了检验大厅，进一步将出入境检查正规化和专业化。与此同时，瑞丽市政府批准建立了更多的珠宝市场，还探索出了更多有效的市场管理经验，比如在每个市场设立珠宝质检处保障消费者利益并打击市场假冒伪劣现象。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城市，瑞丽和德宏州兴建了多条连接国内外的高速路、铁路、飞机航线。这些基础设施的出现，既为瑞丽吸引沿海地区制造业搬迁创造了条件，也方便了大量来自东南亚国家的外籍人员进入我国务工。

也是在这个时期，外籍人员社区人口规模逐步扩大，瑞丽市政府仅依靠基础设施治理手段难以实现社会治理目标，于是瑞丽市政府开始借助外籍珠宝商会对社区进行间接治理和直接治理。这两种治理方式在初期形成了“内外分工”的格局，即社区内部依靠商会间接治理，而社区外则依靠行政能力直接治理。在间接治理层面，前文已经较为详细地描述了商会在社区起到的治理作用。而在直接治理方面，瑞丽市政府将治理资源倾斜在构建和完善当地的外籍人员治理制度上（见图2）。例如，为中缅边境的民众颁发边民证、设置全国第一个外籍人员服务中心等。此外，瑞丽市政府还在跨境医疗、跨境金融、跨境互联网服务等方面先行先试，进行了大量政策性探索，通过这些政策和服务与外籍群体建立了直接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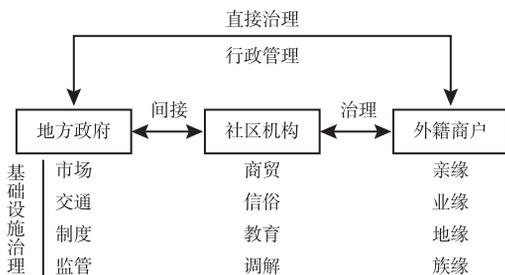


图2 瑞丽市外籍人员社区的结构

四、外籍人员社区内外秩序的错位与失序

2020年之前，瑞丽市政府遵循在社会稳定基础上大力发展经济的治理理念，这与外籍人员社区内部秩序方向一致。因此，作为内外秩序的中介，商会作为中介组织可以较为轻松地协调社区内外秩序，并将外籍人员的日常活动融入瑞丽市政府的治理秩序之中。但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之前形成的社区治理秩序也存在危机，即内在不稳定性和外在变动性。从内在秩序的不稳定性来说，虽然外籍人员社区的基层秩序依靠惩戒制度和拟亲关系维系，但其核心仍是传统的翡翠跨境贸易以及实地零售批发相结合的商业模式，所以这个基层秩序能够维持的基础恰恰是这套商业模式能有效地为所有参与者创造价值。而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基层秩序一方面调和了各阶层之间的矛盾，但另一方面也决定了矛盾调和的上限，无论翡翠业的雇主和雇员之间如何模拟亲属关系，也无法形成像东南亚华人社区内的那种牢固的宗亲关系（李亦园，1996）。相反，如果这个商业模式遭到挑战，那么依附于其上的雇佣制度和拟亲关系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乃至衰败。

其次，外籍人员社区内的其他产业均围绕翡翠业而展开，即社区经济发展缺少第二根支柱，也让社区秩序和翡翠经济存在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翡翠经济和其他经济一样受到供求关系的制约，因此国外一旦出现较大规模的社会动荡，翡翠业和外籍人员社区都会受其影响。雇主和雇员关系随之受到波及，难以维系；而经济实力萎缩的外籍珠宝商会也缺少资源提供社区服务，以及凝聚各阶层成员的能力。此外，外籍人员社区金字塔形的利益分配结构让在中下层的外籍人员有更强的改变现状的动力，急于谋求与主流经济合作的机会，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这导致依靠

同族雇主和雇员间雇佣与情感关系构建的社区基层秩序快速瓦解。

从外在秩序的变动性来说，虽然瑞丽市政府在外籍人员治理上采取了多种政策创新，但其政策空间受到整体出入境管理政策的宏观制约。外籍人员虽然在瑞丽生活工作经商各方面都比较自如，但他们的身份都是“暂居”，外籍人员社区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瑞丽对外籍人员治理的弹性空间的大小，而这一因素不受该社区影响。过去，瑞丽市政府有足够的治理弹性空间，而这一空间本质上源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路的扩展，而当经济建设不再是唯一关键指标的时候，外部秩序与内部秩序的目标将不再一致，外籍人员社区的整体秩序也将面临巨大压力。

（一）直播电商的兴起与内在秩序不稳定性的加剧

2018年，一种新型电商——直播电商——的火爆极大地改变了翡翠业原有的商业模式。所谓直播电商，是指电商卖家通过视频直播向消费者介绍和销售自己的产品。面对翡翠业可观的获利前景，以互联网巨头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开始力推直播电商。直播电商更新了人们生活的游戏规则以及社会关系，为社会的边缘创新提供了实践空间，拓宽了个体行动的自由度（陈雪娇、喻国明，2021）。和之前的出租车行业、线下零售业一样，原来外籍人员对翡翠行业的垄断也很快被平台经济、直播经济所打破。

从基层秩序来说，直播电商冲击了外籍人员社区的同族雇佣模式，导致基层秩序的瓦解。来自瑞丽和外地的直播电商企业纷纷开始和头脑灵活、中文流利的外籍人员合作开展翡翠直播。主流经济对移民经济的吸纳虽然会进一步壮大该产业，但也会改变原有的经济模式。在翡翠直播业中，受雇于直播公司、经过短暂培训的外籍人员在直播中变为表演者，他们以翡翠售卖者角色出现，而中国籍主播作为买卖双方的中介与外籍人员议价互动，炒热在线即时销售的“真实感”。而这种合作模式的普及打破了外籍人员内部原有雇佣模式的垄断地位，给缺少资本或销售渠道的外籍人员提供另一条事业发展的赛道。

在从直播电商中的获利明显高于传统雇佣模式的情况下，普通外籍人员也更多地选择受雇于我国直播公司，而非同族雇主。部分外籍人员因为与我国直播公司合作而从电商经济中分得巨额利润，甚至获得超过老一辈外籍商人所拥有的财富。原来的雇主们因为习惯于原来的经营模式，虽然手握大量财富但却不敢轻易地涉及新

兴的直播电商，担心合作不慎会影响他们来之不易的财富和地位，但同时他们又不得不面对自己生意被直播分走市场份额的现实。PJ表示：

好多直播公司来找，我不想做，也不敢做。我也搞不懂他们哪个是正规的哪个是骗人的，不敢随便做了嘛。（访谈资料编号：20220219 PJ）

从中层秩序来说，直播电商的兴起改变了传统的行业地点和居住地点选址习惯，让中层秩序也面临压力。外籍珠宝商人在面对互联网经济进袭的时候毫无倚仗，他们所构建的社区秩序也随之岌岌可危。过去，由外籍大商人们把持的珠宝商会，依靠来自翡翠贸易的经济利润、对信俗事务的管理，以及与瑞丽地方政府的良好互动，成为外籍人员社区的主导力量，外籍人员在我国遇到问题会主动寻求商会的帮助。但直播电商的兴起，让相当一部分外籍人员在脱离了原有雇佣关系的同时，也和原社区的其他外籍人员产生区隔，最终导致他们离开外籍人员社区，搬到了直播公司附近居住，在空间上与社区内的其他外籍人员居民产生区隔，也降低了对商会的依赖。XH就搬到了靠近直播基地的社区居住，她说：

以前在那边住方便，都是老乡嘛，吃的住的都方便。现在我们晚上直播到2点，太晚了，下班那边都没吃的了。直播公司附近的店都开到凌晨5点、6点，吃东西方便，我就和我的朋友出来住了，她们都是做直播的。（访谈资料编号：20220810 XH）

这一系列变化加深了参与直播电商的外籍人员的社会融入程度。加入直播业的外籍人员会与他们的中国合作伙伴进行频繁的社交活动，从同桌吃饭到同屋生活。他们的中文水平也迅速提高，从简单的模仿中国主播说话，到掌握更多生活化的表达，甚至很多外籍人员将“老铁”“666”作为自己的口头禅。一部分外籍人员在文化上也逐渐被我国人所影响，开始时兴过春节并在春节期间发红包、抢红包，日常休闲游戏也变成当地人喜欢玩的牌类游戏，连红白喜事都增加了我国人常见的发红包环节。这种全方位的融入让这些外籍人员加深了对我国居民的信任。大量加入翡翠直播的外籍人员在居住空间、生活习惯、文化风俗、社交网络、信任纽带上的变化，都加剧了看似牢固的外籍人员社区的分化，让以珠宝商会为核心的社区秩序遭遇空心化。

（二）地方治理路径转向与外在秩序变动性的加剧

外籍人员社区外在秩序的变化包括三个层次：政府治理策略的转变、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和行业经营方式的变化。而外籍人员社区原有的外在秩序的兴衰存废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一直取决于瑞丽市政府所采取的社会治理路径的直接影响。而瑞丽作为一个地处边境的县级市，其治理路径的选择不可避免地受到上级政府对其在我国地缘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定位、中央直属部门和地方治理者的条块关系，以及一河之隔的邻国政治经济局势等因素的多重影响。当外在因素均发生变化的时候，面对瑞丽政府治理路径的大幅调整，当地外籍人员的个体能动性、集体应对策略和机制所能发挥的作用则微乎其微。

其一，政府治理策略的转变对外籍人员社区的影响。瑞丽一直都是我国对外发展战略中的关键一环，不仅是云南省自贸区四大片区之一——德宏片区的所在地，也是云南省“十四五”规划中沿边产业带、口岸经济的重点地区，在“一带一路”倡议、印度洋战略和中缅经济走廊规划中扮演关键角色。但瑞丽三面与缅甸北部接壤，自缅甸建国以来即饱受边境治理的挑战，还会因为缅甸社会治理水平低下而受到传染病防治、违禁品走私等各类社会问题的波及，又和对面的缅甸地区一齐构成了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跨境场域，使得瑞丽当地时刻面临严峻的经济安全、国家安全、社会安全的复杂情势。因此，发展与安全一直是当地治理的两大主题。

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中，当地治理者受制于有限的资源，往往只能在上级政府指示下，结合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治理策略。据调研了解，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因为瑞丽的姐告口岸对面的缅甸木姐市位于缅甸中央政府管辖区域，政治经济局势较之中缅其他双边口岸或通道更为稳定，双边交流互动频繁、关系良好，为双边经贸、人员往来创造了良好的营商和用工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享受沿边开放、境内关外等优惠政策的瑞丽市以“经济发展”为主，推动了翡翠业的有序发展和繁荣，从而为外籍人员社区构建了稳定的外在秩序。

而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瑞丽面临陡然加大的传染病防控压力，有限的财政、人员和行政资源均投入该项工作中，导致当地经济受到严重冲击。与此同时，缅甸国内局势动荡加剧，不仅原本鞭长莫及的缅北地区与缅甸中央政府离心离德，连近在肘腋的缅甸中部地区也出现剧烈的社会冲突。2023年秋缅甸的动荡局势更是直接影响了我国西南边疆的社会安定。面临多重挑战的瑞丽—木姐口岸难以持久通关，

双边经贸、人员往来严重受阻。据调研了解，因为局势变化，连翡翠贸易的供应链都发生了相应调整，更多依赖海运从广州进入我国，而非经陆路从瑞丽入关。而瑞丽原本希望发展的沿边产业园也因为招工困难而对东部劳动密集型企业吸引力大减，目前仅有原计划十分之一的外籍劳工从事制造业。在这种大变局之下，瑞丽政府主动被动地将治理路径从“经济发展”转到“总体安全”上，外籍人员社区则面临前所未有的外部态势变动。

瑞丽政府的治理路径转向也导致瑞丽的外籍人员治理的弹性空间大大缩小。当地政府一改过去对外籍人员社区进行间接治理的模式，将其纳入常态化的网格管理之中，原有的社区结构也从顶层发生变化。瑞丽政府将外籍人员社区网格化，任命多位社区工作人员担任网格员，每人管理 500 人左右的居民。由于单个网格员难以管理人数巨大的外籍住户，因此他们寻找了一部分汉语较好的外籍人员担任网格助理协助各项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由商会派遣，一部分是由与网格员关系较好的外籍人员担任。瑞丽政府这一系列直接管理的措施大大削弱了商会对外籍人员社区的治理能力。

其二，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导致外籍人员生活困难重重。在翡翠贸易、翡翠零售、直播电商都受到整体经济下滑影响的情况下，外籍人员靠之前库存的原石生活，大打价格战，亲缘关系因为利益矛盾而出现裂痕。

以前我让我弟弟帮我卖石头给他的老板，他还愿意帮我，现在他帮我，我要给他钱。因为我们都没钱了，什么都要算清楚。（访谈资料编号：20220218 MMD）

此外，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也使得外籍人员寻找别的商业机会非常困难。

有中国朋友和我联系，约我一起做更换摩托车电瓶的生意。如果我可以出门的话，我可以一家一家上门推销，或许这个生意可以持续下去，但生意并不是很好。（访谈资料编号：20220220 XDD）

部分外籍人员原本就没有积蓄，又失去了工作，无法承担每个月 500—1000 元不等的房租和瑞丽相对较高的日常生活开支，只能回国。随着这个社区内从事翡翠行业的外籍人员的大量离开，又进一步导致了该社区内其他商业的萎缩，依赖翡翠

经济的聚集区经济也开始衰颓，例如，餐馆、咖啡厅减少等，都在加剧外籍人员的离开。而当整个社区经济陷入恶性循环时，原本的基层秩序逐步松弛。过去以外籍珠宝商会为核心的中层结构因面临内外压力而被打破。因为珠宝市场多次关闭，珠宝商会理事们的生意下滑，他们支撑自己家庭的日常开支都逐渐变得困难，更无力负担雇员及其家庭的开支。此外，信俗服务站和外语学校也已经关闭，珠宝商会理事们难以管理社区内部的宗教和教育事务，逐渐丧失了过去的威信。

其三，翡翠行业经营方式的变化导致外籍人员更积极地寻求外部合作。在瑞丽市整体经济受到冲击的情况下，依靠线下市场的传统翡翠行业也纷纷转战线上的直播销售。翡翠行业雇佣方式、从业方式和行业地点的变化，使依赖翡翠业生活的外籍人员需要积极地寻求外部合作，以适应行业的整体变化。因此，他们从销售者变为了表演者，也更积极地融入主流社会。这导致同族雇主和珠宝商会对其的影响力逐步减弱。

珠宝商会原本担任瑞丽市政府与普通外籍人员之间的协调者与中介者，他们一方面必须遵守我国的法规和当地的管理，另一方面又要消除普通移民因对地方政策不理解而产生的不满和怀疑。因此，当普通外籍人员积极寻找机会和我国商人合作时，商会对社区的约束力和支配力受到削弱，这也导致社区中层结构开始解体。而大量外籍人员离开瑞丽，以及外籍雇员的依附关系从同族雇主到我国雇主的转变，也让外籍社区的基层关系秩序进一步松弛。

之前，外籍人员社区外在秩序与内在秩序的核心目标都是发展经济，因此商会作为内外中介，可对具体问题进行调整，确保社区的平稳运行。但是，随着外在秩序的核心目标开始转向，内在秩序却仍旧要求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内外秩序之间的张力导致商会难以协调。而这种内外秩序的不一致加剧了外籍人员社区结构的失衡，使其走向衰败。

五、总结与反思

本研究通过对在瑞丽的外籍人员的长期调查，以“内外秩序”为分析框架，描述了外籍人员在瑞丽创业经商、发展经济、搭建关系、形成内外秩序、建构社区结构及其衰败的全过程，展示了我国外籍人员社区秩序的变迁历程。

以“内外秩序”框架分析外籍人员社区的生成、变迁与衰败历程，可以使我们突破原本仅从外籍人员社区内部或者外部进行单一分析的桎梏，兼顾内外秩序分析移民社区的发展历程。虽然“内外秩序”分析框架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解释工具，但同时它也存在一些问题。原来的“内外秩序”分析框架没有关注内外秩序之间的协调机制，并认为自生自发的内部秩序具有自我调节机制。在将该理论运用于外籍人员社区时，我们可以发现，外籍人员商会在其中充当了重要的中介角色，并且外籍人员商会一直在对内外秩序进行平衡和协调。一旦内外秩序不一致，中介也难以在其中进行协调平衡，该商会的权威也会大幅缩减。因此，我们在分析外籍人员社区时，不仅仅需要关注社区内部的构成和外部环境对其的影响，还需要关注内外秩序之间的协调与平衡机制是如何运作与协商的。

从内部秩序来说，外籍人员社区内部的自生自发秩序往往与个体的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由于来到我国的外籍人员难以获得我国的公民身份，成为永久居民，个体的行动目标往往是赚取经济利益，再返回原籍国。因此，外籍人员社区的内部秩序主要基于不同阶层个体的经济动机，而外籍人员的跨国经济模式、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活只影响着内部秩序的组织方式，并不会成为稳固社区的基础。当内部个体的经济利益受损时，个体会积极向外寻求援助，导致社区的内部秩序快速瓦解。因此，我国大部分外籍人员社区的内部秩序都是不稳定的。

从外部秩序来说，我国的外籍人员管理、侨务政策，乃至当地政府对外籍人员的治理模式，以及原籍国的政治经济环境等都会影响外籍人员社区的外部秩序。多重外部秩序的交织互动与我国和原籍国的外交关系、经贸往来、文化交流密切相关。本案例不仅反映了一个外籍人员社区的历时性社会变迁，还为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我国在不远的将来如何有效治理外籍人员提供了鲜活经验和宝贵教训。

对于治理者来讲，外籍人员社区由于其自身文化、秩序和规范的特殊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外籍人员社区内部的治理作用，这样可以使外籍人员在自己熟悉的文化范围内受到规范和管理。但建立在族裔情感和伦理上的治理效率难以标准化、制度化和体系化，容易出现难以管理的局面。因此，外籍人员社区的治理需要当地政府在依法治理的前提下，积极引导外籍人员的内部监督，形成互相制衡、互相监督的内部环境。此外，地方治理者也需要加强对外籍人员的直接治理。外籍人员在我国生活需要租房、做生意、务工等等，加强商业监管、劳务监管和对我国房东的监管，方可实现有效的直接治理。同时，应加强对监管人员的培训，避免在日常监

管过程中与外籍人员产生文化冲突。在外籍人员的社区内部治理和地方治理者的直接治理中形成良性互补，并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和调节二者互动的力度和深度，在保留一定治理弹性空间的同时，建立直接、可控、高效的治理体系。

边疆的外籍人员社区治理，不仅涉及我国边疆的安全稳定，更涉及我国的国际形象问题，因此更需要慎重处理。在确保外籍人员不威胁我国边疆安定的基础上，坚持互相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方针。在日常工作中，增加懂语言、懂文化的社区治理专业性人才的培养、引进，一方面能为政策制定提供有效建议，另一方面也能进行柔性监管。

最后，构建内外秩序的协调与平衡机制，不应单方面地依赖外籍人员商会，还应构建多种沟通渠道和协商机制，加强当地政府对外籍人员的直接治理。而当地政府对外籍人员的直接治理需要寰宇意识，在权利尊重的基础上兼顾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不仅可以加快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格局，也可以在外国民众心中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

参考文献：

- 陈雪娇、喻国明，2021，《技术迭代视角下直播电商的发展逻辑，动力模型与操作要点》，《新闻爱好者》第1期。
- 达尔，罗伯特·A.，2011，《谁统治：一个美国城市的民主与权力》，范春辉、张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狄金华、周敏，2016，《族裔聚居区的经济与社会——对聚居区族裔经济理论的检视与反思》，《社会学研究》第4期。
- 哈耶克，弗里德利希·冯，2000，《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邓正来、张守正、李静冰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
- 何俊芳、石欣博，2020，《义乌阿拉伯商人的社会融入探究》，《西北民族研究》第3期。
- 李亦园，1996，《人类的视野》，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 李志刚、杜枫，2012，《中国大城市的外国人“族裔经济区”研究——对广州“巧克力城”的实证》，《人文地理》第6期。
- 宋宗员、刘云刚、安宁、赵启康，2022，《跨国移民的地方感研究：以在穗非洲移民为例》，《人文地理》第4期。
- 吴丁埃，1962，《宝石》，曼德勒：兴隆印书馆。
- 项飙，2012，《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18，《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项飙，约翰·林德奎斯特，2019，《流动，还是被流动：跨国劳务的基础设施》，《社会学评论》第6期。
- 赵聚军、齐媛，2020，《我国国际社区治理中的外籍居民参与——基于京津三个国际社区的观察》，《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 周敏、王大磊, 2021, 《外籍人员创业与族裔社区建设——以美国洛杉矶华裔和韩裔经济为例》,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2期。
- 周雯婷、刘云刚, 2015, 《上海古北区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形成特征》, 《地理研究》第11期。
- Breton, R. 1964, "Institutional Completeness of Ethnic Communities and the Personal Relations of Immigrant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0 (2).
- Hunter, F. 2017, *Community Power Structure: A Study of Decision Makers*. Chapel Hill, NC: UNC Press Books.
- Light, I., G. Sabagh, M. Bozorgmehr & C. Der-Martirosian 1994, "Beyond the Ethnic Enclave Economy." *Social Problems* 41 (1).
- Light, I. 2010, "Transnational Entrepreneurs in An English-Speaking World." *Die Erde* 41 (1).
- Liu, C. Y., J. Miller & Q. Wang 2014, "Ethnic Enterprises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GeoJournal* 79 (5).
- Lin, M. & M. Zhou 2005, "Community Transform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Ethnic Capital: Immigrant Chinese Commun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1 (2).
- Ma, X. 2019, "Unpacking 'Koreatown' in Chinese Metropolis: Urban Governance, Variations in Ethnic Incorporation and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47 (17).
- Min, P. G. 1996, *Caught in The Middle: Korean Communities in New York and Los Angele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iller, D. C. 1958, "Industry and Community Power Structur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n American and An English C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3 (1).
- Polsby, N. W. 1960, "How to Study Community Power: The Pluralist Alternative"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22 (3).
- Schuch, J. C. & Q. Wang 2015, "Immigrant Businesses, Place-Mak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A Case From an Emerging Immigrant Gateway." *Journal of Cultural Geography* 32 (2).
- Xiang, B. 2017, "The Base: A Case of Infrastructural Governance of Labour Outmigration in China." *Mobilities* 12 (2).
- Zhou, M. 1992, *Chinatown: The Socioeconomic Potential of an Urban Enclave*,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2007, "Non-Economic Effects of Ethnic Entrepreneurship." In Dana, L. P. (ed)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Ethnic Minority Entrepreneurship: A Co-Evolutionary View on Resource Management*.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 Zhou, M. & M. Cho 2010 "Noneconomic Effects of Ethnic Entrepreneurship: A Focused Look at the Chinese and Korean Enclave Economies in Los Angeles." *Thunderbir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52 (2).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张方亮）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游天龙）

责任编辑：张书琬